

作为竞争与疗法的叙事：疫情传播中个体叙事的生命书写、情感外化与叙事建构

陈 刚

【摘 要】新冠疫情传播中,作为记录和记忆个体疫情体验与情感的个体叙事,以在场“第一视角”的生命写作和互动式叙事,外在地成为与国家叙事、媒体叙事相互补的一种社会再生产的叙事力量。同时,透过“故事叙说”“情感与问题外化”的叙事疗法,内在地驱使个体身心自主的“朋友圈疗伤”。疫情这个特定的情境中,其叙事价值在于建构了疫情与自我身份认同、社会现实、国家民族认同等超越个体经验的普遍意义。进而在比较的视域和语境中理解疫情个体叙事的伦理局限及其争议。

【关键词】新冠疫情;个体叙事;生命写作;叙事疗法

【作者简介】陈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南京社会科学》,2020.7.97~106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互联网传播新形态与中国传播能力建设研究”(17JJD860003)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考察社会事实的原始分类时发现,“当社会遭遇一个极端状况时,能使我们更好地察觉到社会事实。而在正常情况下,这些社会事实,虽然也同样重要,但发生的规模小而且不系统”。^①2019年年底发生的新冠肺炎(Covid-19)事件,被中央指导组在2020年2月2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定性为“疫情是建国以来的一场非常战役,病毒来势之汹、疫情传播之烈、范围扩散之广、全社会所面临的挑战之大,堪称前所未有”。突发疫情不仅严重威胁了人们的生命健康,也极大地冲击了社会秩序和日常生活状态。社交媒体时代疫情传播的多重叙事场域中,作为记录和记忆个体疫情体验与情感的个体叙事,成为与国家叙事、媒体叙事相互补的一种社会再生产的叙事力量。那么,如何结合典型文本,通过对个体叙事本体思维活性和情感想象力的考察,理解疫情传播中个体叙事内

在和外在的价值,以及与其他叙事之间的关系;如何透过个体叙事中体验与情感的记录、记忆,理解个体叙述中疫情与自我、社会现实、国家之间的叙事建构及其伦理局限性。

一、“在场性叙事”与“第一视角”:疫情信息拼图中的个体叙事

叙说是人类的天性,而人类世界和社会生活内在的可叙事性,使叙事中介化为人类自主认知与建构自我,以及认识理解他者、社会的一种思维方式。根据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等叙事学者的研究,叙事(narrative)的实质就是叙述故事,包含三层基本涵义,即故事(事实、情节)、话语(叙说所使用的符号载体)和叙述(行为),并由此延伸和细分出叙述者(叙事主体)、受述者、叙事语法等叙事概念和理论。在叙事类型上,作为与体现权威性、合法性,强调主题性、统一性和目的性等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相指称的一种

叙事与思维方式,以个体经验和私人生活为基础的个体叙事(individual narrative)是从个体的视角,主要以事件见证者或亲历者的在场身份,记录、描述和评述事件的一种书写方式。相对而言,个体叙事属于一种非专业化写作,具有私人性、个人化、强烈的个体意识等特点,以及记忆、再构事件的功能。同时,在集体记忆理论的开创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看来,作为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形式,任何个体化叙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文本”的痕迹。^②换言之,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体叙事,具有叙事思想和价值判断,个体叙述的过程也是记忆与再建构事件的社会化过程。网络新媒体传播时代,叙事日益多样化的现实与传播语境下,公众越来越多地通过个体叙事或个体经验来理解社会现实的多样性,尤其是在涂尔干所言的当社会处于极端状况时,如战争、突发灾难等。疫情传播中,作为国家叙事、媒体叙事等重要补充的个体叙事就展现出不可忽视的叙事活力与传播张力。事实上,几乎每个人都是疫情事件的经历者或见证者,因为看到了或亲身经历了事件,都有可以叙说的“可得性叙事”(available narratives),即在特定语境下能够被讲述的关于特定主题的故事。^③所以个体就拥有了在场式书写和讲述的内容与条件。

此次疫情传播中的个体叙事,首先,是新闻媒体机构设置的专供疫情个体叙事的栏目,包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口述记录”、《南方都市报》的“武汉日记”、《长江日报》的“武汉日记”、澎湃新闻的“医护日记”,等等。这类广义上的疫情个体叙事是媒体灾难报道的一个突出的变化,其内在的一个重要驱动是为适应自媒体的传播语境而推出的融合性叙事。相对而言,这类个体叙事记录个体的在场性经验的同时,其协商性更强一些。美国叙事学者艾米·舒曼(Amy Shuman)认为,不论是作为证人,还是作为一个目击者、参与者,或将重构的故事据为己有的人,在讲述故事时都试图在“应该讲的”与“不应该讲的”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④这类疫情个体叙事的协商性,既体现叙事者的自我协商,也包括媒体与个体之间的专业协商。其次,是微信、微博、豆瓣等平台上的图文防疫日记,以及抖音、B站等社交

短视频上的视频防疫日记。这些网络新媒体平台上的“武汉日记”“封城日记”“抗疫日记”等电子日记,成为个体叙事和记录疫情经历与体验的主要表现方式。截至2020年4月30日,以上述关键词搜索的记录显示,微信公众号、豆瓣等平台上相关日记有近万篇,微博Vlog(视频日记)的阅读量更是上亿次,抖音和B站上的热点话题防疫日记累计均有过亿次的播放量。其中,“方方日记”“小引诗歌”“林晨同学”等是影响较大的疫情个体叙事。此外,还有少数网络新媒体也推出了“记录普通人的疫情故事”的栏目平台,致力于汇集和分享个体的疫情故事。

作为在场式书写参与疫情个体叙事的行动者,包括患者、医护人员、媒体从业者、作家、志愿者、外卖小哥、学生以及其他普通人等经历者和见证者,以第一视角的日常记录,在场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和切肤体验,真实而细腻,“相比新闻里严肃的文字数据,日记则多了一份温度。那些饱含创作者个人情感的文字、旁白让用户产生一种代入感和‘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情绪,顺势打开他们的情感阀门”。^⑤

二、作为互补式竞争的个体叙事:疫情个体叙事中的生命写作与互动式叙事

在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看来叙事如生活本身,无处不在。一方面,疫情的突发性、复杂性、群体性及危害性等特征,内在地决定了疫情信息传播与叙事的多样性;另一方面,突发疫情危及公共健康和安全,是从国家、社会组织机构到个体都必须面对、或者说经历的共同问题,也外在地驱动了疫情叙事的日常化和生活化。由此,体现国家意志与民族精神的国家叙事、讲述主流故事的新闻媒体叙事以及叙说个体经验的个体叙事等,共同构造了此次疫情的叙事版图和信息拼图。美国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认为叙事之间具有潜在的竞争(contest)是叙事的一种本质特征。叙事的这种显性或隐性竞争,主要表现在不同的叙事如何讲述同一社会事实。^⑥

关于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疫情的传播叙事中,国家叙事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和作用,重在从国家视角着眼于国家、民族的整体和全局,透过召开重要

会议、重要政策措施的制定实施、领导人的讲话指示、新闻发布会等多种方式,其中,截至2020年4月30日,召开了8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国新办举办了各类相关新闻发布会近50场,权威、及时、全面地介绍疫情防控的整体布局和各方面的进展情况,展现和传递面临灾难和危机时国家的意志、行动力及制度性的力量。

作为国家视角的叙事,疫情国家叙事从国家、人民、历史的必然需求出发,代表着疫情的一种宏大叙事,具有正当性、权威性、统一性、合法性等叙事特征,彰显了家国情怀和强烈的责任与使命感。国家叙事中的疫情“是一场没有旁观者的全民行动,是一场齐心协力的人民战争。”(国新办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2020年2月20日),其讲述的是以“生命至上,人民至上”为疫情治理核心理念的中国经验和方案。在叙事话语与修辞层面,从新中国成立初期防治血吸虫病的“送瘟神”、2003年的“抗击非典”到此次的“抗疫”,灾害疫情国家叙事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表现是战争叙事和军事隐喻的使用,将灾害疫情隐喻为“人民战争”“阻击战”等,其作用在于从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全国性动员和充分调动整合资源,继而转化为国家的统一行动。因此,重大突发疫情的国家叙事,在传递和传播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鼓舞和坚定信心,凝聚力量和共识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全球化语境下在面对人类共同问题时,以国家视角讲述疫情的“中国故事”,传播国家和民族的声音至关重要,“我们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民族,不论从本体论还是从道德角度上讲,好的历史叙事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叙事可以塑造一个民族的天性,帮助理解他们生活的意义”。^⑦

疫情的多重叙事中,新闻媒体也是重要的叙事主体。相对而言,新闻媒体的疫情叙事,可以称之为职业或专业叙事。此次疫情的媒体叙事,中央级媒体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的主题报道,各省级媒体的“众志成城抗疫情”特别专题,《财新周刊》《财经》《三联生活周刊》等市场化主流媒体的系列全景式深度调查性报道,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媒体的职业精神和社会责任。媒体的信息传

播与沟通是预防传染病传播的一个重要且有效的手段,其叙事具有中介化的作用,一方面,发布权威信息,国内外宣传解读国家相关政策措施,讲述疫情防控的“中国故事”;另一方面,利用新闻媒体的职业优势,深入到疫情前线,采访医院、一线医护人员和患者等,以融合报道的创新方式,向外界多方位、多角度报道和展示疫情一线的真实情况与问题,服务公众对疫情信息的需求。疫情的媒体叙事,重在讲述疫情中的主流故事,体现的是疫情传播的一种公共叙事和专业话语力量。其中,如果再细分一下,疫情媒体叙事中官方主流媒体的叙事,也属于宏大叙事,也是传播国家声音的国家叙事的一种代表和重要体现。

与上述两种主要的疫情叙事相比,疫情的个体叙事则是以个体身份进入疫情叙述、建构和再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叙事与话语形式。疫情个体叙事叙述的重点往往是国家叙事和媒体叙事等覆盖不到的地方,或者说不够突出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叙事也是一种竞争性叙事。詹姆斯·费伦提出理解个体叙事需要将对个体叙事的分析置于一个更大的、通常是隐含的多种叙事选择的竞争中。^⑧因此,与其他叙事相比较,作为疫情日常叙事的个体叙事,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以第一视角叙述个体经验和生命经历的个体叙事,具有朴实而真挚的生命写作(life-writing)意味,其叙事话语特征主要表现为私人话语的使用。个体疫情叙事与生命写作中的私人话语更加个人化和直白,真情流露充满了对生命的感悟和人生态度的反思。

“经历了生死,我觉得看世界都不一样了。有人说,在生死面前,一切都是小事。但是我觉得,在经历过生死之后,我们更应该去好好的活着,珍惜眼前的人,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去做一些你能够做到的事。”^⑨

这种个体生命写作与叙事也极具日常化、生活化,一些疫情的个体叙事讲述了对生命中父子、夫妻等家庭亲情关系的反思与再认识,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和特征。

“住院期间,时常会想起父亲。他是一个不善言辞、比较冷淡的人,像中国的大多数父母,

爱孩子,但不会表达。那一刻,心里突然很难受,很牵挂……”^⑩

叙事话语与修辞方面,个体叙事的另一个特征是其私人话语与国家、媒体叙事话语之间的“话语转换”,这种本能自然、非主观的话语转换,使得个体叙事的私人话语更具个人化特征。国家、媒体叙事中的“人民战争”“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等话语和修辞,在个体的叙事中则更直观具体、更具个人情感。

“这就是普通中国人,他们偶尔也会有意见,有牢骚,但国家出了大事,二话不说也会扛起自己的那份责任:医生冲进前线,警察日夜轮班,工人支援基建,老百姓甘愿蜗居在家;有志愿者送菜,有快递小哥送药,有好心人捐口罩,也有人不断宣传防疫。”^⑪

媒体叙事中的“英雄”“白衣天使”“最可爱的人”,则转换为个体叙事中包含生命亲情的“亲人”“家人”“恩人”。

二是作为共同经历和共享的特定情境(situation),疫情驱动和实现了个体叙述的社会化过程与意义建构。换言之,可以产生共情的疫情满足了个体的情境需求,疫情的个体叙事建构了叙述者与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进一步强化了个体叙述的互动式叙事(Interactive narrative)和角色转换。个体的情境包括需求、欲望、条件和经历等时空要素,它为共同在场的他人明确表达关注的仪式性姿态提供了指示性方向。个体的情境是充满符号的场域,符号的使用和接收建立在意义共享的基础上,陌生人社会中的情境互动依赖于符号载体而完成。^⑫疫情个体叙事中,自媒体中的图文日记、微博、抖音、B站等社交媒体上场景呈现的Vlog及弹幕等,共同构建了疫情个体叙事的符号和意义共享与互动场域。由此,可以看到,作为一种叙事声音的一些个体讲述吸引了为数众多的阅读者和互动对话的叙事参与者。如果说“小引诗歌”等为代表的图文日记,体现了疫情个体叙述从自媒体到“朋友圈”的一种图文符号互动叙事,而Vlog博主“林晨同学”等观察和记录武汉全城抗疫的Vlog,在社交短视频平台上数以千万计的播放量,满屏的弹幕及“武汉加油”的留言,则是另一种个体叙述的影像场景式互动叙事。

叙事学研究由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或者说复数叙事学发展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由更多地关注文本本身,转向关注叙事与社会、文化、政治等之间的关系。就个体叙事而言,舒曼认为互动式叙事研究是关注个体叙事的重要视角,它强调从讲述者和听众的互动关系上分析叙事的过程及意义。其重点不仅是关注叙事内容本身,更要关注参与者在对话中是如何进行角色转化的。^⑬疫情的个体叙事中,这种基于共同情感与心理的互动叙事的过程与意义在于,使一个个听者、观者成为疫情叙事的构成部分,通过讨论转发、评论、提供线索信息,以及激活他者的讲述和表达冲动等方式,形成“朋友圈互动叙事”效应,实现了由接收者成为叙事行动者的角色社会化和公共化的转变,从而使个体叙述成为戈夫曼所言的一种公共场所的行为。

总体而言,疫情传播的国家、媒体和个体的多元叙事模式,建构和形成了以体现国家意志与民族精神的国家叙事为主导,以信息沟通、舆论引导,讲述主流故事的媒体叙事为关键,以叙说个体经验的个体叙事为重要互补的疫情传播叙事的新结构。疫情的多重叙事形成多样性信息的公开和传播流动,对疫情的防控及全面地记录、记忆和反思等,其作用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作为疫情叙事的重要力量,无论是国家、媒体叙事还是个体叙事都是疫情的一种见证和反思,共同构建了疫情国家、民族记忆的空间和版图。一方面,不同层次叙事的覆盖与互补,避免了疫情叙事的断裂,这种视角不同的互补式竞争场域中,以更直观,更具代入感的“第一视角”和生命写作与互动式叙事的个体叙述,使疫情主流故事之外的个体经验得以被覆盖。生活的经验比论述的内容丰富,叙事的结构能够组织经验,并赋予经验以意义。总有些感受和体验是主流故事覆盖不到的。^⑭另一方面,从叙事的情感与认同看,一位患者的叙述和体会,“个体命运与国家力量如此关联,万幸的是,全国各地的医疗队驰援武汉,国家来救我们了”。^⑮一位前线媒体记者在口述中说:“去武汉,不是个人英雄主义,也不是一腔愚勇。只是因为手中有话筒,心中有热爱。我热爱新闻、热爱生命、热爱这片土地。”^⑯疫情的这种互补式竞争叙事所包含和反映的

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共鸣情感与共赴国难的情怀是共同的基底,也体现了疫情多重叙事的情感融合。

三、作为疗法的叙事:疫情个体叙事中文本的情感外化与“朋友圈疗伤”

以“第一视角”和生命写作讲述自我的体验和观察的疫情个体叙事,既有事实性的叙述,也隐含丰富、细腻的个人真情实感,这是个体叙事的一个重要特征。作为叙事的私人情绪、情感和心理,也是解释和理解疫情个体叙述及其社会意义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向度。一位患者在个人叙述中坦陈:

“出院了,写下24天的流水账,这是父亲和我的真实经历,是这个冬天,留守武汉的900万市民,其中的一个样子。写完后,就放在那了,想过,找时间发出来。也有考虑,就搁那儿,也许就是一点个人的心灵史。”^⑦

对个体而言,包含叙事性认知的经验讲述和生命书写,是个体在面对疫情的影响和伤害时,透过个体经验的记录、重组和再生产,建构自我认知重构个体生命故事及共情的社会情境,其叙事的隐喻在于故事即生命,讲述即跳动的脉搏,叙事的过程既是自我的心灵对话,即包含感情和心理底色的生命体会及释放和彻悟的过程,也是情感裸露和外化,寻找生命之力量和生活之意义的社会共享、共情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疫情的个体叙事,也是医治和消除心中的“疫情”和心理创伤的一种自我心理治疗,从而使叙事具有疗伤的作用和意义。叙事疗法(narrative therapy)的创始人迈克尔·怀特(Michael White)和大卫·艾普斯顿(David Epston)的研究发现,“患者”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书写传统是很重要的机制。寻求治疗的人往往觉得生活看起来毫无变化,自己又无力介入,追寻新的可能性和意义常常阻碍重重。这样看来,就书写传统可以促使我们在时间向度上厘清自身经验而言,这种传统可以为治疗提供很多东西。^⑧理解作为疗伤的疫情个体叙事的一个关键路径与面向是作为中介与符号互动象征的文本外化。换言之,个体透过对疫情的讲述和书写将内在的情感、心理感受等转化为外在的、可以被感知的符号文本,进而在“围观”和互动中,寻求情感共鸣和心理的抚慰与理解。显然,外

化(externalization)尤其是文本中的情感外化是治疗过程的关键。在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其认为心灵、思想和概念这些东西都是内在的、抽象的,虽然是普遍的、绝对的和真实的,但都没有现实性。它们必须借外在对象表现出来即外化,而“人有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之中实现他自己,而且就在这实践过程中认识他自己。”^⑨叙事疗法中,外化式叙事和对话能够拓宽叙事空间,从而实现对问题叙事的解构与重构。由此,作为疗法的个体疫情叙事的文本外化具有过程性的两层基本意义指向:

第一个层次是作为移情与共情的情感外化。在共同的经历和情境中,个体疫情叙事的生命书写,其本色是通情,包含从移情、同情到共情,从入情入心到反思彻悟的自我呈现及外化过程。

“没有尝过封城滋味的人,一定无法理解类似的恐惧。病毒肆意,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⑩

这些个体疫情叙述者的叙事文本中所外化折射出的恐惧、焦虑等情感和心理情绪,既反映了个体的真切感受,也成为共同经历者产生移情和共情的情感与心理因素。依据舒曼的研究和观点,“移情”是一个重新评价叙事的意义的过程,故事的讲述最大限度地提供了移情和理解他人的可能性,而移情则最大限度地提供了跨越时空理解他人的可能性。^⑪移情提供了一种跨越不同经验的相互理解的方式,而个体叙事文本中外化的情感则是重要的产生这种互动理解和移情的符号象征,其深层的社会意义在于,面对危机、困境甚至死亡时,“记录生命失落、失意、失重、失控、失速、失魂、幻灭的体验,由此揭示疾苦的非技术面相,抒发生命险境中人性、灵性、诗性,并挤压出人们对生命本质的觉悟。”^⑫同时,透过反映式移情和另我移情,将有共同体验或经历的他者视为另一个自我,从而拉近并重构讲述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作为人类关系的一部分,移情不仅仅在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中,在任何地方,人们都会通过在情感上重现他们共同体验的重要方面来构建他们现在的关系。^⑬因而,可以说,疫情期间个体之间因叙事而成为相互的情感感知和通情者,也是相互的治疗师。

第二个层次是作为治疗的外化。疫情给经历者带来的身心伤害,尤其是心理的创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现代心理治疗中讲述自我的故事(问题)被认为是一种治疗的选择,或者说是一种有效的心理治疗方式。从心理学层面说,由疫情、个体、叙事、围观者等构成的叙事场域,也是由叙事作为中心的心理治疗过程。作为一种后现代心理治疗方法,叙事疗法主张将人的故事叙说置于治疗过程的中心,透过与治疗师之间的自主互动,让叙事者重新认知、叙述和建构自我的人生经历,从而获得心理的疏导和治愈并开始新的生活。叙事疗法最早是由澳大利亚临床心理学家麦克·怀特和新西兰的大卫·爱普斯顿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种心理治疗理论,后被广泛用于灾难、教育、临床等领域,具有去中心化、去本质、去权威等治疗特点。叙事疗法将治疗比喻为“说故事”或“重说故事”,即遭遇问题的人的生活和经验的过程,探索故事的意义,那些用白纸黑字写下的经过筛选的事件与意义,用于治疗的书信与证书等很具体地促成人重新去创造新的、令人得以脱困的叙事,从而使相关者的生活大大解脱、有变化。^③叙事疗法的基本治疗方法和理念包括“故事叙说”“外化”等,“故事叙说”是心理治疗的中心过程。在怀特和爱普斯顿看来人所知的生活是透过“活过的经验”(lived experience)得知的。那么,人怎样组织活过的经验?人和这种经验以什么样的关系赋予其意义,从这种经验的生命中寻找出什么意义?活过的经验怎样表达?因此,若要创造生活的意义表达我们自己,经验就必须成为故事,成为故事这件事决定了我们赋予经验的意义。^④因而“自我故事”是有生命的东西,每个人用其故事来展现其人生和经历,而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的建构和诠释者,也是自己的治疗专家。外化则是治疗的关键,叙事疗法认为外化是一种治疗方法,这种治疗法鼓励人从心理将压迫他们的问题客观化,有时则拟人化。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问题变成和人分开的实体,即“人不同于问题”,所以问题是原本被认为是问题的人或关系之外的东西。作为心理治疗的外化具有:(1)减少无益的人际冲突;(2)降低失败感;(3)让人互相合作,共同面对问题;(4)打开新的可能;(5)促使改用较轻松,没

有压力的方法看待问题;(6)提供对话的可能。^⑤此外,叙事疗法还认为环境、互动及社会规范、意识对叙事治疗具有社会建构性作用。

疫情个体叙事中文本内外之间的转化,饱含“口罩下普通人”切身经历和真情实感的,在时间上具有一定连续性的故事叙说的过程,也是个体由外化进入叙事治疗的过程。布鲁诺强调这种故事叙说的意义在于,“当我们实现表达时,我们会再体验、生活、创造、建构和塑造我们的文化。这种实现不是去表达原本就存在于文本之内的意义……而是通过实践去建构新的意义”。^⑥这种新的意义,以故事叙说中的情感外化为基础,从情感共鸣到心理认同,进而转化为有意或无意的心理治疗行动。由此,作为治疗的个体故事叙说与外化,透过故事叙说和情感、问题的外化,释放和治疗由疾病的未知与不确定性带来的紧张恐惧,以及情感孤独和时间焦虑等内心的苦闷、挣扎和冲突。美国心理学家卡伦·霍妮(Karen Horney)认为外化的作用在于将内在的冲突社会化、客观化,从而有助于缓解或者解决内心的冲突,只有解决了冲突,我们才能变得更加健全、完整和成熟,从而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和内在的安宁。^⑦而内心的冲突如果得不到疏导和解决,则会导致畏惧和绝望,甚至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心理阴影之中。

根据叙事疗法的解释,疫情个体的故事叙说及情感外化,有助于个体间的对话互动与合作,面对共同的疫情问题和心理冲突,从而激发自我及群体性身心治疗的“朋友圈疗伤”行动,进而打开新的可能,重新体触生命的力量和生活的意义。一位用600张照片记录自己“九死一生”的感染和治疗经历的患者,在叙述中讲述了其与医护人员、亲朋好友及陌生人之间的故事与情感互助及心理修复历程:

“听这段音乐,也让我血脉喷张,我要呼唤我的免疫力、我所有的力量、亲人、战友、朋友,跟病毒决战,我不怕你!”^⑧

另一位患者则记叙和分享了其通过微信群和朋友圈共同抗疫的经历和过程:

“我入院第二天就建了一个微信群,那个群的名字是我取的,叫做必胜小分队,我想帮大家传递一些能量,互相加油打气。”^⑨

与此同时,作为治疗的问题外化,既是实现叙事治疗的关键方式,长期来看也是个体观察、思考和理解“瘟疫与人”“人与问题”,努力与自己安宁相处,建构积极的自我认同,从而消除内心冲突的一种自我心理重建方式。一位从事新闻工作的患者,在自述中记录了自我心理与人生信念的重生过程:

“我觉得我好像完成了一次蜕变,一次重生,我觉得相当于给了我再活一次的机会。我要活得更好,也让身边的人活得更好……”^③

疫情个体叙事中,除患者的叙说之外,还有医护人员、志愿者、物流工作者、外卖小哥等的亲身经历和所见,以及学者、作家、学生的所思所感等。这种个体疫情叙事中有两个年青群体值得关注,一是占援鄂医护人员三分之一的“90后”和“00后”,其叙述自信飞扬、积极乐观,充满强烈的使命感;二是在读大学生,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的新闻传播学、社会学等专业的学生,通过校园新媒体平台讲述疫情期间青年学子的个体经验和家国情怀,引发社会关注。其中,由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开办的微信公众号“@话媒书会”,设置了“新型肺炎中的个体叙事”专栏,截至2020年4月30日,共刊发了30篇个体叙事的文章。从学生的视角记录 and 讲述了疫情期间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不乏深刻的心理反思与治疗叙事。一位研究生在叙述中讲述了其通过书写和阅读进行自我心灵治理:

“阅读能让人学会与孤独融洽相处……到底是阅读让我更能承受甚至享受孤独,还是孤独承受力让我基本能做到随时静下心来阅读,我说不清。但拥有这样一个习惯和这种能力,我觉得很幸运。”^④

此外,疫情发酵的地域歧视、偏见及污名化等问题,也是个体叙事中讲述的一个重要内容和心理感受。作为叙事心理治疗的外化,提倡将人与问题分开,“人不等于问题”,让问题是问题、人是人,这是叙事心理治疗的精髓所在。^⑤叙事疗法强调社会建构、规范的影响和作用,因而歧视、偏见等问题是社会建构的,与文化、历史等相关,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个体特质。因此,疫情个体叙事中,“疫情是病毒造成的,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我们武汉人、湖北人也是受

害者”等心理认知性外化叙事,也有助于理解疾病与人的关系,减少无益的人际冲突,降低失败感等,从而帮助个体重拾自信走出心理困境。

四、超越个体经验:疫情个体叙述的叙事建构、伦理与局限

理解疫情传播中的个体叙事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本文选择以个体叙事作为考察的本体,重点讨论了外在宏观层面的作为互补式竞争的个体叙事和内在具象层面的作为心理疗法的个体叙事。无论是作为竞争还是作为疗法的个体叙事,一个不能忽视的关键问题是,在作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疫情这一特定的、也是人类共同面对的公共情境中,进入公共传播领域讲述个体经验和故事的个体叙事,无疑也是具有超越个体经验的社会性与公共性叙事。失落在主流故事之外的生活经验,也是个体的“独特结果”,虽然是独立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但是某一社会范畴的成员基本要穿越任何人的生活历程的社会纤维共同的东西。^⑥同时,“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而任何个体的故事经验、心理与情感诉求等的叙说与疏导解决,最终还是要回到相应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之中。因此,从这些因素上说,个体叙事就不仅是个体的,而是具有超越个体经验的叙事建构和普遍意义。那么,如何理解疫情中个体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建构性叙事关系;疫情这个特定的情境和传播语境中,就叙事本身而言个体叙事对其他叙事,尤其是媒体叙事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有何可借鉴和吸纳的价值;如何在竞争与比较的语境中理解疫情个体叙事的伦理与局限性等问题。

首先,从本质上看,作为一种记录和记忆的个体叙事,是个体以符号形式对自我存在状态的一种描述和认知性建构。疫情的个体叙事则是个体记录和重构自我疫情体验与经历的在场式书写,其个体故事被赋予更广泛的意义,体现了超越个体的、人类的、共享的、普遍的叙事与意义建构。理解叙事建构的关键在于认识叙事与主体建构的关系,也就是叙事在主体建构中所起到的作用。透过前文的分析,总体而言,疫情个体讲述的叙事建构主要体现为三重关系:一是疫情、故事与自我。疫情个体叙述的叙

事建构是以个人故事为意义象征和中介,以讲述疫情中自我独特的体验为主体内容符号,建构自我的身份认同,从而获得在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疫情进程中与宏大叙事相互补的能够被具体感知的个体意义。其中,饱含个体情感与思维认知的故事,以及组织、讲述的方式等,决定了个体疫情经验的意义和自我的身份认同。二是个体叙事与社会现实的建构。美国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认为人类存在两种思维模式,范式模式(paradigmatic mode)和叙事模式(narrative mode)。这两种思维模式,每一种都提供了独特的组织经验和建构现实的方式。其中,叙事处理人类或像人类一样的意向和行为,及标志他们过程的变迁和结果。它力求把一些无时间性的奇迹放入经验的细节中去,并将经验定位于时间和空间中。^⑤事实上,生活本身就是叙事,现实本身即是叙事的一种形式。疫情个体叙事中,一个个由普通的叙事者以独特的视角讲述的鲜活的生命故事,成为与媒体叙事和国家叙事互补的叙事视角与体验,共同建构了社会现实与历史记忆;三是个体叙事与民族、国家认同。在疫情这个特定的“国难”场景和情境之中,个体讲述的虽然是自我的故事,但这些讲述自然而然地包含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情感与认知,体现并建构了个体对国家的情感与心理认同,以及民族自豪感。个体叙事中隐含的“共赴国难,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超越个体经验的国家归属和民族认同,展现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

其次,进一步回到个体叙事本身,从历时性来看,与以往相比此次疫情传播中现象级出现的个体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灾难叙事的信息分布和传播格局,尤其是个体叙事与宏大叙事的互补,以及前文所述的个体叙事与媒体叙事的交叉融合等都显示疫情个体叙事的力量和影响。其中,就叙事本身而言,以视角特殊、细节和情感丰富等见长的个体叙事,对传统媒体而言,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反思其叙事观念和方式。此次疫情传播中,一些传统媒体的疫情报道中出现的为网民所诟病的“拿女性(医护人员)身体做宣传”“扔下……就走”的模式化报道、过度渲染英雄情结、典型报道叙事陈旧,以及内

外有别“湖北人遭歧视,外国人被优待”的抗疫事迹报道等,反映了部分传统媒体在叙事观念和方式方面的不合时宜与思维“时差”。因此,疫情的传播,在叙事方面需要进一步强化开放协作的理念,以更加多元化、个性化和鲜活的叙事讲好疫情故事。客观全面地考察和评价疫情的个体叙事及其意义,另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就是理解作为竞争与疗法的个体叙事的伦理与局限性。个体叙事的特性和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也隐含、或者说决定了它们不足和弊端。美国思想史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认为,历史是一种叙事的论述,其内容是想象、杜撰的与发现到的成分参半。^⑥此次疫情个体叙事中,由于信息来源受限或不明,或者受网络谣言、未核实信息等的影响,出现的传播虚假信息、谣言、阴谋论等非理性叙事现象,容易传播放大焦虑和恐慌,竞争中加剧了“信息疫情”(infodemic),客观上也使一些个体叙事引发社会争议,成为事件本身。同时,疫情个体叙事中,由于“叙事不对称”,对私人体验和情绪的过度渲染和描绘,尤其是对隐含各种情绪和价值判断的细节的“刻意”寻找和非理性叙述现象也需要反思。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曾提醒,“在单一的事件中,没法区分出特殊的因素,因此,也就不能阐明事件的真相。”^⑦此外,有的个体叙事中存在渲染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现象也需要警惕和价值引导。

事实上,个体疫情叙事存在的这些问题,实质上是与个体叙事自身的局限性密切关联,而这种局限性本身,显然也是个体叙事自身特性的一部分。理解这种作为特性的局限性,还需将个体叙事置放于比较的视域和语境中思考除个体叙事与宏大叙事关系之外的三种关系:一是个体叙事与专业化写作,疫情个体叙事是否属于专业化写作;二是个体叙事与新闻叙事,疫情个体叙事是否等于新闻叙事;三是个体叙事与公共声音,疫情个体叙事能否代替公共声音。显然,厘清和反思这些看似简单的关系,方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作为生命写作和灵魂叙事的疫情个体叙事的价值、局限和超越个体经验的普遍意义,也有助于理解个体疫情叙事背后的质疑、争议等现象。

注释:

①Durkheim, Emile & Marcel Mauss, *Primitive classifi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43.

②[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

③Norrick, N., *The dark side of tellability*, *Narrative Inquiry*, 2005, 115(2), pp. 323-343.

④⑬⑭[美]艾米·舒曼:《个体叙事中的“资格”与“移情”》,赵洪娟译,《民俗研究》2016年第1期。

⑤Ceci:《从公号到B站:“武汉日记”何以走红》,微信公众号“微果酱”(ID:wjam123456),2020年3月7日。

⑥⑧[美]詹姆斯·费伦:《竞争中的叙事:叙事转向中的又一转向》,王安译,《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

⑦Wilfred M. McClay & Ted V., McAllister(editors), *Why Place Matters: Geography, Identity, and Civic Life in Modern America*, Encounter Books, 2014, p.27.

⑨⑩⑪郭静:《郝丹的口述实录:再活一次,我要活得更好》,微信公众号“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ID:zgzs001),2020年2月29日。

⑫⑬孙晓媛等:《8个新冠肺炎感染者的真实故事:只有一根救命稻草也要抓住》,央视网,2020年2月28日, <http://news.cctv.com/2020/02/28/ARTIFRuShSwoRVyLgcm02Qhi8200228.shtml>。

⑭王耳朵:《看到“封国”后的意大利乱象,才知道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微信公众号“王耳朵先生”(ID:huangezishiba),2020年3月12日。

⑮[美]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贾春增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页。

⑯⑰Bruner, Edward M., *The 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6, p.143, p11.

⑱中国记协:《元宵节,我们依然在战斗》,微信公众号“中

国记协”(ID:zgjaxca),2020年2月8日。

⑲张武宜:《我和父亲的非常24天!》,微信公众号“看呐文化”(ID:CreativeCT),2020年3月19日。

⑳㉑㉒[澳]迈克尔·怀特、[新西兰]戴维·爱普斯顿:《故事、知识、权力——叙事治疗的力量》,廖世德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8、4、9、31页。

㉓[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9页。

㉔凡小西:《哭了!武汉封城7天,我的真实经历》,微信公众号“凡小西”(ID:fanxiaoxi800),2020年1月29日。

㉕王一方:《生命书写,共情与反思齐飞》,《新京报》2019年3月9日。

㉖Oriana Bernasconi, *Negotiating Personal Experience over the Lifetime: Narrative Elasticity as an Analytic Tool*, *Symbolic Interaction*, 2011, 34(1), pp. 20-37.

㉗[美]卡伦·霍妮:《我们内心的冲突》,王作虹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

㉘易小荷:《确诊新冠肺炎后,他用600张照片记录在ICU的九死一生》,微信公众号“骚客文艺”(ID:soulker2017),2020年3月3日。

㉙屠江川:《疫情信息汪洋中的愤怒与反思》,微信公众号“话媒书会”(ID:huameishuhui),2020年2月10日。

㉚[英]马丁·佩恩:《叙事疗法》,曾立芳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页。

㉛Erving Goffman, *Encounters: Two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Interaction*,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1, p.127.

㉜Jerome S. Bruner, *Actual Minds, Possible Worlds, Possible Worl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1.

㉝[英]基思·詹金斯:《论“历史是什么?”——从卡尔和艾尔顿到罗蒂和怀特》,江政宽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5页。

㉞[法]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黄艳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